

広島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Hiroshima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itle	宋元的貨郎（“常賣”）與書畫交易
Author(s)	HUANG, Xiaoxia; LIU, Zhengping
Citation	Hiroshim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 19 : 61 - 67
Issue Date	2024-03-31
DOI	
Self DOI	
URL	<a href="https://ir.lib.hiroshima-u.ac.jp/00055635">https://ir.lib.hiroshima-u.ac.jp/00055635</a>
Right	
Relation	



## 宋元的貨郎（“常賣”）與書畫交易\*

黃曉霞

杭州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劉正平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and trading marke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relatively developed.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painting establishments and painting academies in the creation and exchang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ntiti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painting marke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rticle has searched and 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poems, notes, painting theories, and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involving painting establishments and painting academies, it was found tha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painting market was centered around these institutions, connecting painting artists, nobles, regular sellers, and market merchants to facilitate the trad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prosper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closely ti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premises and painting academies.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ainting houses and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painting academies, which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d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dditionally, it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the "often sell" group in the middleman role of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rad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hich was distinct from the "tooth". This occupation mad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circul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market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Painting studio; painting workshop; painting market; Song Dynasty

在中國古代，繪畫作品產生後，流通和交易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對推動畫作的收藏、鑒賞、研究和藝術價值的提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畫史和畫論著作對這一環節涉足較少，其關注的視角往往是繪畫源流、師法傳承、書畫技法、畫家傳記和作品收錄與品鑒等，由此也影響到現有的繪畫史敘述，比較重視作家作品的描述和考論，對藝術家的師授傳承和階層流動有較為深入的研究，總括畫人姓名、畫作數量，品而第之，特別是對優秀的畫作著墨較多，比較容易忽視繪畫流通環節的研究，特別是古代繪畫交易和流動的情形。自2000年前後起，國內關於古代書畫市場的研究逐漸興起，出現了唐宋書畫藝術市場的專項研究。<sup>1)</sup> 這些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提出了新的視角，增添了繪畫史研究的新篇章。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從宋代“畫肆”和“畫院”的角度，繼續深入挖掘和勾勒宋代繪畫市場的發展狀況，展現兩宋繪畫交易和流通的基本面貌，關注宋代特殊的“常賣”群體在書畫交易中的地位。之所以將畫院也作為考察對象，是因為宋代特殊的畫院體制在人才選拔、培養和考核方面，催生了部分市場需求，並將“常賣”這個仲介群體推到我們的視野之中。

畫肆和書肆的性質近似，都具備專業從事書畫和書籍銷售的功能，不同之處在於業務重點。“畫肆”是指專門從事書畫作品買賣的店鋪，也可以叫“畫鋪”“畫行”“畫坊”等。<sup>2)</sup> 清代著名學者葉德輝在《書林清話》裡論及“書肆緣起”，認為書肆產生於後漢，一直到清代，均有專業從事古籍銷售的各種“堂”“齋”等名目。<sup>3)</sup> 相較而言，畫肆的資料要少得多。雕版印刷技術普及後的，在宋代政治、經濟發達地區迎來了書肆發展的黃金時期，畫肆也初具規模。畫肆是畫市交易的實體機構，

它的出現是成熟的繪畫消費市場形成的標誌。學界目前形成的基本共識是，宋代存在普遍的書畫消費行為和現象，甚至與社會分層有著密切的關聯。<sup>4)</sup> 宋代社會階層流動性加強，科舉制度與畫院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為宋代文人士大夫和畫工的階層流動創造了廣闊的空間，也帶動刺激了社會書畫消費市場的發展，出現了一些經常性的書畫交易行為和相對固定的書畫交易場所。本文重點關注的重點就是畫肆和畫院。

### 一、畫肆：從黃庭堅的一個藏品說起

黃庭堅是北宋著名詩人、書法家，文學史上著名的“江西詩派”的開山祖，書法與蘇軾、米芾和蔡襄齊名，世稱“宋四家”。黃庭堅有一首被畫史研究者廣泛引用卻未能充分挖掘的詩——《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切入點。黃庭堅在詩中講述，他有一件二十年的藏品，是畫家許道寧手筆。許道寧與黃庭堅的父親黃庶交遊，年少時追慕著名畫家李成，模仿李成筆法“手揮八幅錦江絲”贈送“張京兆”，<sup>5)</sup> 隨著張大人的離世，該畫下落不明。後來黃庶在汴京城畫肆一個佈滿灰塵和蛛絲的角落發現了其中四幅，老友舊作重見天日，驚喜忘我，遂花鉅資購得：

大梁畫肆閱水墨，我君槃礴忘揖客。蛛絲煤尾意昏昏，幾年風動人家壁。  
兩雪岑泐滿寺庭，四圖冷落讓丹青。笑酬肆翁十萬錢，卷付騎奴市盡傾。<sup>6)</sup>

這首詩反應了北宋時期畫肆的基本情況，名人藏品會因各種變故流入畫肆，畫工或者畫家的作品也會售入畫肆，而酷愛收藏鑒賞的文人士大夫也會在畫肆中淘到滿意的作品。大梁就是北宋首都汴京，詩中還說“兩雪岑泐滿寺庭”，表明黃庶遊賞的畫肆當在大相國寺。

北宋汴京的大相國寺每月定期面向普通市民舉辦交易會，是一處集圖畫、書籍、器物古玩於一處的成熟的綜合交易中心：“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殿后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sup>7)</sup> 相國寺大殿到資聖門一帶，是書畫古玩交易集聚區，這裡有著名的資聖閣。南北宋之交的文人李廷瓘，回憶自己的父親在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遊玩大相國寺時，曾在資聖閣後面的畫肆買到一幅畫：

先君有博古之名，丙戌秋游相藍，於資聖閣後畫肆獲吳生胡部才一幅爾。水墨成之，細如絲，硬如鐵者，與此政相類。蓋不如此不足擅場也。紹興乙丑九月廿有二日邯鄲李廷瓘。<sup>8)</sup>

這裡的“相藍”就是大相國寺，李廷瓘的父親淘到的是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表現胡樂的一幅水墨畫。可見資聖閣後面的畫肆實力非可小覷，經常有意外之喜，吸引了很多著名文人前往，其中不乏大家。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梅堯臣、蘇軾，以及北宋末年的著名金石家、文學家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等，都是相國寺畫肆、書肆和書畫古玩市場的常客。據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所言，趙氏夫婦家藏金石古玩字畫主要來源就是相國寺：“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sup>9)</sup> 此外，像歐陽修、梅堯臣這樣的著名人物，也是書畫市場的常客，歐陽修曾在汴京書肆淘到一本不同版本《黃庭經》，<sup>10)</sup> 梅堯臣則在汴京書肆邂逅了相交二十三年的老朋友張顥。<sup>11)</sup>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相國寺外，北宋都城開封形成了幾個相對集中的紙畫市場，如宣德樓前西

大街，“街北都驛亭，相對梁家珠子鋪，余皆賣時行紙畫花果鋪席”。皇城東南角的東角樓街巷有販賣紙畫的瓦子。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也有販賣紙畫的市場，這樣的市場每天都會開市交易，每年到除夕前夕，市井之間還會自然形成販賣門神等年節用品的市場：“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鍾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sup>12)</sup>但這些門神、桃符之類，當為宋人所說的“紙畫兒”一類。這種“紙畫兒”是民間行販的諸色圖畫的泛稱，應該包括版印和手繪的各種神佛圖像、桃符、動物畫像等，實用性比較強，藝術性比較弱。這類“紙畫兒”屬於日常生活用品範疇，較難認定為通常意義上的書畫藝術品。因此，我們應當將在畫肆或書肆中交易的真正的書畫藝術品市場和一般的“紙畫”市場區分開來，不能過度擴大和誇張宋代畫市的範圍和規模。

根據現有資料，宋代大部分書畫交易和消費都發生在畫肆和書肆。這些畫肆、書肆主要集中在北宋都城汴京（今開封）和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這樣的中心都市，此外在文化經濟較為發達的紹興府、成都府等地也有畫肆出現。如南宋紹興府的開元寺，也專門開闢了書籍圖畫交易區，定期舉行展銷活動。再如成都府，也有畫肆出現。北宋時期的《括異志》講了一個故事：成都府有個叫許偏頭的畫師，“開畫肆於觀街”，售賣靈泉朱真人的畫像，賺了不少錢。後來因為貪心，夢中被朱真人掌了一頰，遂變成偏頭，人稱“許偏頭”。<sup>13)</sup>這則故事實為道教輔教小說，宣教色彩濃厚，但故事發生地畫肆的存在應該是真實的生活場景。

## 二、畫院：畫工的書畫購買活動

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法明傳》記載，唐代已出現“畫院”：“法明，開元十一年敕令寫麗正殿諸學士，……圖成進之，上稱善，藏其本於畫院。”<sup>14)</sup>這是宮廷畫收藏畫院的情況。唐代供奉內廷的畫家地位不高，即使職位清顯，實質等同於“工伎”，帝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所以閻立本說：“吾少好讀書屬詞，今獨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他告誡其子，不要再研習這門伎藝。<sup>15)</sup>唐五代時期的人才選拔主要通過科舉制度來完成，也有“終南捷徑”可以選擇，但並非主流。科舉考試主要考察士子的詩文和經學功力，選拔目標是治國理政的優秀人才和文學侍從，畫工的選拔則不能通過科舉一途。畫工待詔翰林，或者入職供奉於畫院之中，往往通過從民間直接選拔的方式實現。南唐中主李璟將流散民間的畫家召集到宮廷，建立翰林圖畫院（西元943年），設立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司藝、畫院學士等職位，著名的如顧闳中、高太沖、曹仲元、董源等，這些人才的選拔都不是通過科舉考試。但宋代國家畫院制度的設計者吸取了南唐、西蜀建設國家畫院的經驗，為畫工提供了一定的擢升途徑。

宋代畫家中普遍存在以畫卷干謁的情況，很多民間畫家和畫工的作品得到賞識之後，會被擢拔到翰林圖畫院、宣和畫院這樣的機構，獲得待詔、祇候、藝學等官職，這對畫家、畫工來說，是一次難得的出人頭地的機會。畫工是整個宋代繪畫市場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宋代國家畫院主要有翰林院、翰林圖畫院、宣和畫院等，北宋初年畫家主要來源是西蜀和南唐的畫師，後來逐漸從民間畫工中擢拔，也有部分畫家超擢于市井之中，如畫家燕文貴、王友是軍人，高益是汴京賣藥人。宋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三云：“高益，涿郡人，工畫佛道鬼神、蕃漢人馬。太祖朝，潛歸京師。始貨藥以自給，每售藥必畫鬼神或犬馬於紙上，藉藥與之，由是稍稍知名。時太宗在潛邸，外戚孫氏喜畫，因厚遇益，請為圖畫。未幾，太宗龍飛。孫氏以益所畫《搜山圖》進上，遂授翰林待詔。”<sup>16)</sup>高益的本來身份是集市上的賣藥人，顧客買藥時隨藥贈送圖畫一幅，名聲逐漸

傳開。最終因為跟外戚孫氏結交，被引薦給宋太宗，引起重視，被徵調到朝廷，這是宋代畫工改變命運的一個典型例子。

直至宋徽宗時期，“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鹹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以後，益興畫學，教育眾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複立博士，考其藝能。”徽宗皇帝親自指導和參與畫院的教育工作，模仿科舉考試的形式，出題考試，還設立了畫學博士的職位，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到後來寶籙宮落成，“繪事皆出於畫院”。<sup>17)</sup>這要得益于宋徽宗個人的好尚旨趣和藝術水準。宋代皇室比較重視宗室的藝術和文學才能的培養和考察，徽宗之前的哲宗時期，就進行過宗室的藝術水準考試：“元符初，試宗室藝業，合格者八人，獨明發賜進士出身。”趙士唫，字明發，中進士是元符三年（1100）年，經考察，元符三年是大比之年，所以趙士唫中進士跟藝業考核合格應沒有直接關聯，但很顯然藝業考核合格，又是進士出身的趙士唫，在當時名聲比較響亮，嘗作《高軒過圖》，一時名士賦詩題畫者如雲。<sup>18)</sup>由此可見，宋代畫工，特別是被選拔到國家圖畫院的畫工，其地位要比唐五代時期的畫工清顯，待遇也較高，儘管這個時期畫工跟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人才地位有差距，但比起前代來是巨大的進步了。

宋代畫工被選拔到國家畫院後，有嚴格完善的考核和創作任務，內部競爭比較激烈，自然產生了一些負面現象，如嫉妒成風、造假等。華州畫家李希成進入圖畫院以後，懂得“自晦以防忌嫉”的道德，刻苦用功，直到獲得官職之後才把自己的拿手好戲展示出來，“眾雖睥睨，無及矣”。<sup>19)</sup>在這樣激烈競爭的考核環境下，一些畫工經常從民間畫家手裡收購繪畫作品，用來抵交朝廷徵集畫作的任務，從而催生了一個新的市場出來。宋鄧椿《畫繼》卷六《人物傳寫》記載：

杜孩兒，京師人。在政和間其筆盛行，而不遭遇，流落輦下。畫院眾工，必轉求之，以應宮禁之須。<sup>20)</sup>

其卷七《小景雜畫》亦載：

楊威，絳州人，工畫村田樂。每有販其畫者，威必問所往。若至都下，則告之曰：“汝往畫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爭出取之，獲價必倍。<sup>21)</sup>

杜孩兒擅畫嬰戲圖，其畫作在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非常盛行，但仕途不暢，流落民間。國家畫院的畫工非常看重他的畫，多方轉求收購，原因就是“宮禁之須”產生的需求比較旺盛。絳州畫家楊威瞭解這其中的原委，所以囑咐販賣畫作的人到畫院前出售，被搶購一空，價格也翻了一倍。由此可見，支撐起宋代圖畫市場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家畫院的畫工。

### 三、宋代畫市中的“常賣人”

宋代畫市是由宮廷、士大夫、畫工、牙人、常賣以及各種小店主等支撐起來的。宋代名家裡手畫作的主要購買人群就是士大夫，而且名畫的價格也被炒作得相當高，動輒幾萬、十幾萬、數十萬，巨大利潤空間促使交易非常活躍，以購販從業者眾多。蘇軾和米芾兩人在宋代書畫創作、品鑒和消費領域內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經過此二人品題之後的畫家，往往迅速成名，其畫作也隨之升值。蘇軾對當時的畫市消費和交易情況比較瞭解，其有詩云：“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sup>22)</sup>蘇

軾口中的“貴人”就是宗室高官階層，這一群體多金而有閒暇，對藝術品的需求比較旺盛，爭相購買名畫，甚至有不計價錢者。有收藏癖好的士大夫較多，如歐陽修和趙明誠、李清照夫婦，酷愛金石，前者撰有《集古錄》，後者撰有《金石錄》。李清照夫婦尤其嗜好金石書畫，為購求不惜典當衣物，有時還因財力所限而不得不與心愛之物失之交臂：“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複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sup>23)</sup> 本文重點關注的就是李清照在此處提到的持南唐畫家徐熙《牡丹圖》求售之人的身份。

美術學界一般將此類人視為經紀人、中間人的角色，根據《東京夢華錄》的記載稱之為“牙人”。但實際上，宋代充當圖畫交易各方的中間人的角色有兩種，一種是“牙人”，一種是“常賣”，<sup>24)</sup> 這一職業對促進宋代書畫市場的流通和繁榮做了比較突出的貢獻。牙人是市場上的交易中間人，要互相結保，由政府核實身份，頒發執照，隨身攜帶木牌，有嚴格的約束條款。<sup>25)</sup> 牙人的職責是評估藝術品的價值，議定價格，促使雙方成交，交易地點在政府開設的正規市場上。而常賣則類似於行商，走街串巷推銷書畫等藝術品，或者接受委託搜購藝術品，鮮受市易法等法律法規約束。上述持徐熙《牡丹圖》求售之人，非常符合常賣的身份特徵。

關於常賣，又叫“常賣人”。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和南宋范成大《吳郡志》等文獻均有記載，也頻繁出現在文人筆記、繪畫史著、詩話乃至正史之中，因此這個群體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

朱勳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sup>26)</sup>

范成大《吳郡志》卷五十：

朱冲本以常賣為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sup>27)</sup>

朱冲、朱勳父子出身蘇州，是宋代最著名的常賣，《宋史》卷四七〇《朱勳傳》有傳。朱氏父子以沿街收賣破爛器物、開藥店等謀生。據南宋蘇州人龔明之《中吳紀聞》記載，父子二人平時賣點小雜貨之類，財力漸豐後，開了一家藥肆。<sup>28)</sup> 這成為朱氏父子起家的重要資本，跟《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經歷近似。因為交通蔡京、童貫等人，搜羅蘇州一地的太湖石等“工巧之物”討好京師權貴，見幸于徽宗，官至太尉，一時之間顯貴非常，只有《水滸傳》的高俅差可比擬。未有發跡之前，從朱氏父子的身上可以明顯看出“常賣”的身份特徵和他們兜售交易物品的方式，主要是沿街叫賣和上門推銷，這跟主要在市場上充當中間人的“牙人”是有區別的。

書籍、書畫以及各種珍玩等，是“常賣”兜售的重要內容。北宋著名詩僧惠洪就曾在一個常賣的破篋箱中，發現了一本晉簡文帝司馬昱朝公卿的殘本樂府詩集：“余嘗館州南客邸，見所謂嘗（常）賣者，破篋中有詩編寫本，字多漫滅，皆晉簡文帝時名公卿，而詩語工甚。”<sup>29)</sup> 惠洪是在客邸見到常賣的，進一步印證常賣的流動性。常賣兜售書畫藝術品的例子，在宋代非常多。鄧椿《畫繼》就記載有“常賣”這一類人物的活動：

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蓄珍圖。往往王公貴人令其別識，於是遂與常賣交通。

凡有奇跡，必用詭計勾致其家，即時臨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複以真本厚價易之，至有迴圈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sup>30)</sup>

這位“外宅宗室”是一位收藏家，所以王公貴人們請他來鑒定藏品。結果他與常賣勾結，陰謀詭計調換藏家真品，再將真品高價出售，而且反復以假亂真。此等欺詐性的交易行為，必定是通過常賣來銷贓的，正是看中了常賣的流動性和行蹤不定的特點。根據前文李清照夫婦購買徐熙《牡丹圖》的經歷，我們得知宋代的常賣可以將書畫留置在買主家，給予充分的時間決定是否購買，從而也給買家、常賣、掮客等留下造假、調包的空間。

另外，米芾《畫史》也有多條資料記載“常賣”這類人物，進一步增添了這一群體在圖畫交易中的仲介人的佐證，如：

範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sup>31)</sup>

這是說北宋大臣富弼的女婿范大珪從大相國寺的常賣手裡花大價錢買了一幅《雪圖》，很有王維的名畫《雪霽圖》《雪中芭蕉圖》等的風格。再如，有一吳中士大夫，看到米芾家藏顧愷之《維摩圖》：

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有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sup>32)</sup>

該士大夫認為米芾家收藏的顧愷之《維摩圖》是近世人的手筆，回頭就讓手下找“胡常賣”送來兩本，當然此類屬於偽作，但常賣的能力以及參與造假的亂象，於此可見是多麼瘋狂。

宋代的常賣身份非常複雜，甚至出現士人充當常賣的情況。宋代一個叫朱夢說的人這樣描述這種現象：“當時搢紳之士，競于取媚權豪。易古器，鬻圖畫，得一真玩，減價求售，爭妍乞憐。服儒者衣冠，為侯門常賣。”<sup>33)</sup> 達官貴人為了巴結勢力更大的“權豪”，不惜親自充任“常賣”，高價收購圖畫文玩，再以低價出售給“權豪”。這個說法未免激烈，但還是揭示了宋代常賣活躍在社會各個層面的真實狀況，對書畫的流通交易客觀上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總而言之，宋代書畫市場豐富多彩，參與者眾多，我們將研究的眼光落在畫肆、畫院和常賣三點之上，能夠勾連起宋代書畫交易流通的幾個環節，即以畫肆為中心，形成畫家與收藏家的交易管道；以畫院為中心，形成畫院畫工與民間畫家的交易路徑。而流動販售的常賣人，則是這些交易活動得以完成的重要仲介。關於常賣人的研究，需要專文予以探討。

\* 本文系 2019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專案《中國古代經坊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批准號：19VJX090。

#### 注

- 1) 相關研究有李華瑞《宋代畫市場初探》，《美術史論》，1 期（1993.1）；王仲堯《北宋汴京藝術品市場考述》，《中國經濟史研究》，3 期（2007.3）；肖鑫《唐宋時期的書畫買賣和市場初探》，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李林琳《宋代書畫市場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王楠《宋代繪畫藝術市場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此外有部分期刊論文有對宋代書畫市場繁榮的原

因及特徵進行了探討。

- 2) 宋代畫行缺乏直接的資料佐證，但據姜伯勤先生研究，早在唐朝晚期至於五代，敦煌歸義軍轄區出現了民間畫行。參見姜伯勤《敦煌的畫行與畫院》，載《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編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 3)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2，頁25。
- 4) 秦開鳳，《宋代書畫消費與社會分層》，《學術研究》，5期（2015.5）。
- 5) 張京兆，《山谷集》的編印者、黃庭堅的學生、宋人任淵懷疑可能是張乖崖即張詠。
- 6) [宋]黃庭堅，《山谷外集詩注》，卷15，[宋]黃庭堅撰，[宋]任淵等注，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冊4，頁1328。
- 7)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條，[宋]孟元老等著，周峰點校《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卷2，頁20。
- 8) [明]張丑撰，徐德明校點，《清河書畫舫》花字型大小第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51。
- 9) [宋]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李清照著，黃默谷輯校《重輯李清照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六，頁124。
- 10)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十“黃庭經三”，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冊5，卷143，頁2310。
- 11) [宋]梅堯臣，《桃花源詩并序》，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26，頁895。
- 12)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宣德樓前省府宮宇”“東角樓街巷”“天曉諸人入市”“十二月”條，卷2，頁12、14，卷3，頁24，卷10，頁69。
- 13) [宋]張師正，《括異志》“許偏頭”條，傅成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冊1，卷6，頁681。
- 14) [唐]張彥遠撰，秦仲文、黃苗子點校，《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卷9，頁175。
- 15)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9，頁169。
- 16) [宋]郭若虛撰，黃苗子點校，《圖畫見聞志》（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卷3，頁69。
- 17) [宋]鄧椿，《畫繼》“聖藝”條，黃苗子點校，《畫繼》《畫繼補遺》合訂本（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卷1，頁4-5。
- 18) [宋]鄧椿，《畫繼》“侯王貴戚”條，卷2，頁11。
- 19) [宋]鄧椿，《畫繼》“人物傳寫”條，卷6，頁84。
- 20) [宋]鄧椿，《畫繼》“人物傳寫”條，卷6，頁79。
- 21) [宋]鄧椿，《畫繼》“人物傳寫”條，卷6，頁96。
- 22) [宋]蘇軾，《僕曩于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于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冊3，卷16，頁829。
- 23) [宋]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李清照著，黃默谷輯校《重輯李清照集》，卷6，頁124。
- 24) 關於牙人的研究，學術界關注頗多，可參王仲堯，〈北宋汴京藝術品市場考述〉，《中國經濟史研究》，3期（2007.3）。關於常賣的研究，可參楊焄〈宋代人究竟如何說話〉，《文匯報·文匯學人·學林》（2017.5.12）。楊文主要從宋代說話藝術角度考察“常賣”。
- 25) 王仲堯，〈北宋汴京藝術品市場考述〉，《中國經濟史研究》，3期（2007.3），頁33。
- 26) [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7，頁121-122。
- 27) [宋]范成大，陳振嶽點校，《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50，頁662。
- 28) [宋]龔明之撰，孫菊園校點，《中吳紀聞》“朱氏盛衰”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6，頁145-147。
- 29) [宋]惠洪著，李保民校點，《冷齋夜話》“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字”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冊2，卷2，頁2175。按，此點校本“常”作“嘗”，《四庫全書》本正作“常”。
- 30) [宋]鄧椿，《畫繼》“雜說”，《畫繼》《畫繼補遺》合訂本，卷10，頁123-124。
- 31) [宋]米芾，《畫史》，黃賓虹、鄧實主編，《美術叢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集2，輯9，冊19，卷下，頁49。
- 32) [宋]米芾，《畫史》，卷下，頁41。
- 33) [宋]張知甫，《可書》“朱夢說言搢紳取媚權豪”條，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錄》《過庭錄》《可書》合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413。